

# 基督教在近代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生态格局中的传播<sup>[1]</sup>

马明忠、张 科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民族大学)

**内容提要:**青海是中国多民族格局下多宗教共存的典型缩影,宗教寺观教堂遍布全省各地,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在这种多民族、多宗教生态中,现代基督教的分布和发展趋势,与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基督教如何与近代青海地区民族、宗教、文化相互交流、适应、互动,是观察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发展重要视角。

**关键词:**基督教、近代青海地区、传播

**作 者:**马明忠,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研究,西宁市黄河路2号,81001 青海省。电话: +86-131-9577-8150。电子邮件:382344133@qq.com。张 科,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3号,81007。电话: +86-139-9727-5983。电子邮件:qh-myzhangke@163.com。

青海历来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既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种民族文化的交融,也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等多宗教共存,体现出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一种异质文化进入多民族、多宗教的青海地区,必然与多元的民族、宗教文化发生相互交流、适应、碰撞,自然会产生互动、冲突或认同的社会关系。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一个陌生社会文化体系中彰显,被人们所关注,逐渐成为多民族文化、多宗教信仰中的元素,融合于多民族文化区域之中,共同架构了多元一体、多元通和的地域文化模式。因而,从近代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个案,是观察研究当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视角。

## 一、基督教在近代青海地区传播的历史轨迹

1877年1月,内地会传教士伊斯顿(Easton)和帕克(Parker)进入甘肃地区,他们遍游全省各重要地区并分发六种语言之经书,在藏族中开始进行传教事业,开启了近代基督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1885年,甘肃省所属兰州、西宁、宁夏成为新的宣教区,西宁、宁夏分别以藏人和蒙古人为主进行宣教

---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Chin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ject《基督教在当代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研究》(批准号:14BZJ040)、青海民族大学2016年“区域宗教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布道。<sup>[2]</sup> 可以视为基督教在青海传教之始。以西宁府为中心向周边藏人和蒙古人传教,在这之前,西宁已有三个传道之地,临近西宁的大通县有两个布道中心。<sup>[3]</sup> 1888年,称之为剑桥七杰之一的杜斯德(Cecil Henry Polhill,1860-1938年),来到西宁针对藏人进行传教工作。<sup>[4]</sup> 此后,传教士不断进入青海地区传教。

1891年英国传教士劳受福、胡立礼、乐以成先后来到西宁传教,将民主街租的民房设成青海第一座教堂,成为传播基督教活动基地,陆续向各地宣道布点。<sup>[5]</sup> 不久,胡立礼以1000多两白银购得该房。1892年荷兰瑞吉纳特(Petrus Rijnhart)来到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所在地鲁沙尔镇进行传教工作。1896年6月瑞吉纳特夫妇又到丹噶尔(湟源)传教。<sup>[6]</sup> 1904年,胡立礼又购得教场街1号袁春华和宋发旺二人的地皮约6.5亩,建造了福音堂,盖了礼拜堂和传教士宿舍,即现西宁教场街基督教堂。1908年美国传教士柏立美(V. G. Plymire)进入甘肃及西藏的边界工作。1909年内教会传教士进入贵德地区时,早有传教士成立传教中心,已有13名皈依信徒。<sup>[7]</sup> 1911年3月3日,英国传教士连福川(F. D. Learner)来到西宁,负责西宁及周边地区藏人的传教工作,主要来往于藏人和汉人交汇之地的大通、贵德、化隆、民和、湟源等。在西宁专门开设了“福音客栈”,为入住的藏、蒙、土等族散发《圣经》,传播基督教。<sup>[8]</sup> 从1915年开始至解放前夕,传教士以西宁为中心,在青海回、藏、土、撒拉族等聚居地区大通、互助、湟中、民和、化隆、循化、保安、贵德、湟源设立福音堂或传教点,如安息日会陕西籍牧师陈文学在西宁传教设堂,后在乐都县城仓门街东侧和大通许家寨设立教堂,美籍传教士海春深(Harris, George K.)在西宁祁家场(现西宁市城中公安分局所在地)设立专门针对穆斯林的传道

[2]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 Zhonghua xuxing weiyuanhui 编,蔡詠春 CAI Yongchun、文庸 WEN Yong、段琦 DUAN Qi、杨周怀 YANG Zhouhuai 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nian Zhongguo jidujiao diaocha ziliao [Data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1901-1920]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年版), 第342页。关于近代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青海时间,刘继华 LIU Jihua, “19世纪后期青海基督教传播史考述 19 shiji houqi Qinghai jidujiao chuanboshi kaoshu”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Qinghai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19 century],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Xibei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Vers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年第五期,刘继华 LIU Jihua、张科 ZHANG Ke,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早期相遇 Jidujiao yu Yislanjiao zai Qinghai de zaoqi xiangyu” [The early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Qinghai Province], 《青海民族研究》Qiqinghai minzu yanjiu [Study on Qinghai Ethnicities] 2012年第三期,认为《青海省志·宗教志》Qinghaisheng zhi Zongjiao zhi [Record of Religions in Qinghai Record]、周振鹤 ZHOU Zhenhe《青海》所述史料有误,其实这些书籍记载有关传教士进入青海的资料都来源于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这是在华传教士编撰的调查资料,所述人物及时间一般不会有误,故1877年1月,内地会传教士伊斯顿 Yisidun (Easton) 和帕克 Pake (Parker) 进入青海最早的传教士。

[3] 房建昌 FANG Jianchang: “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 Jidujiao zai Qinghai chuanbo xiaoshi” [A little history of Christian spreading in Qinghai],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Qi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Social Sciences Version) Version of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89年,第3期。

[4]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 Zhonghua xuxing weiyuanhui 编,蔡詠春 CAI Yongchun、文庸 WEN Yong、段琦 DUAN Qi、杨周怀 YANG Zhouhuai 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nian Zhongguo jidujiao diaocha ziliao [Data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1901-1920]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年版), 第342页。

[5] 甘肃省图书馆 Gansusheng tuduhuguan 藏:《甘肃全省教堂图》Gansu quansheng jiaotang tu (附说) [Pictures of All Churches in Gansu Province], (上下册)。

[6] 房建昌 FANG Jianchang: “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 Jianada jidujiao chuanjiaoshi Ruijinate fufu zai Qinghai zangzu diqu de chuanjiao huodong ji qita”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anadian missionary couple Ruijinate in the Tibetan region in Qinghai and others],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Qi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89年第2期,第120~122。

[7] 房建昌 FANG Jianchang: “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 Jidujiao zai Qinghai chuanbo xiaoshi” [A little history of Christian spreading in Qinghai],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Qi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Version of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89年,第3期。

[8] 房建昌 FANG Jianchang: “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 Jindai xifang jidujiao chuanjiaoshi zai Zhongguo xibei shaoshu minzu zhong de chuanjiao huodong ji youguan wenxian gaishu” [A documentarian review and the activities of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Chinese North-West Region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Late Modern period], 《西北民族研究》Xi-bei minzu yanjiu [A Study on North-West Ethnicities], 1994年,第1期。

所,美国神召会柏立美夫妇和白丽秀在湟源,美籍宣道会汪霄鹏、汪雷道蕴(女)二人在同仁保安堡,宣道会美籍牧师海映光、霍尔顿夫妇在循化,“对藏人传教会”的白约翰夫妇在化隆巴燕戎格,英国籍马道康夫妇在贵德传教。贵德福音堂先后有美、英、加拿大、瑞士等 8 国牧师服务于此,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籍白嘉礼、白多慈夫妇。1949 年 6 月,湟源福音堂开始由中国籍牧师任重度、秦步瀛主持。1951 年 8 月,贵德马是道康被驱逐出国,基督教活动停止。1952 年 2 月 11 日,青海基督教由河北籍牧师孟昭翰主持,把内地会、神召会与安息日会合并为西宁市基督教会,由国内教会牧师主持。同年,兰州基督教灵修院来的实习学生张恩光、顾永信,西北传教福音团的冉异群、祁文英(女)、李近泉(女)、陈更新、星映光等来西宁传道,1953 年先后离开了西宁教会。解放前夕,全省共有基督教堂 19 处,有外国籍牧师 18 人,其中男 8 人,女 10 人;美籍 5 人,英籍 9 人,加拿大籍 3 人,瑞士籍 1 人;属内地会的 15 人,神召会的 3 人。另有中国牧师 1 人,属安息日会,信徒约有 400 余人。

## 二、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组织结构及社会事业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我国发展较快。民国初年先后来华的基督教团体 170 个左右。<sup>[9]</sup> 基督教传教团体仅在名义上是一个“团体”,它们各自为政。到 1905 年有 63 单独的差会,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财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sup>[10]</sup>

### (一)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组织结构

基督教传入青海始于 19 世纪末。各差会陆续派传教士来此布道,内地会等教会组织在青海各地开展活动,由于新教内部派别林立,各自为政,形成了与天主教不同的传教组织模式。

#### 1. 组织机构

基督新教教会的管理体制为执事会,管理权一般集中在主教、牧师之手,负责教会、堂点的教务、行政事务。长老、执事协助管理本堂点行政事务。

基督教自 1888 年传入青海,由于基督新教的差会在组织上是相对独立和各自为政的,它们没有一个中心,各个差会依照它本身的势力自行划分传教区域,在行政上、经济上独立行事。“差会总堂”是指一个差会单独的工作区,而“驻在地”是指由一个或几个差会的代表长驻工作的城市,与“总堂”的数目无关,一个“驻在地”内可能有几个“总堂”。在计算一个省里有多少总堂时,凡有独立宣教士(人数不限)工作的城市都算作“差会总堂”。<sup>[11]</sup> 基督新教一般把凡有外国宣教师常驻其中的城市或镇称为宣教师驻在地。一个宣教师驻在地中可以同时有几个差会的代表。1910 年之前,甘肃省共有总堂 12 所:内地会 6 所、协同会 3 所、宣道会 3 所。<sup>[12]</sup>

青海基督新教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一般以吸收成年人入教为主,主要精力花费在扩大影响上。另外,当时汉族中多少读过些书的人,以儒教自居,不肯接近洋教。一般居民对牧师看病尚有些许好感,但对入教却人数很少,到福音堂作礼拜的最多时不过 100 人左右,有的地区甚至仅二三人。少数民族中因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几乎无人信奉基督教。即或有人信奉,也是出于看病、上学

[9] 牟钟鉴 MOU Zhongjian、张践 ZHANG Jian 著:《中国宗教通史》*Zhongguo zongjiao tongshi* [The whol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k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3 年版),第 1006 页。

[10] [美] 费正清 FEI Zhengqing:《剑桥中国晚清史》*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 shi*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 Chinese Qing](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3 年版),第 596 页。

[1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 Zhonghua xuxing weiyuanhui 编,蔡詠春 CAI Yongchun、文庸 WEN Yong、段琦 DUAN Qi、杨周怀 YANG Zhouhuai 译《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nian Zhongguo jidujiao diaocha ziliao [Data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1901-1920](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7 年版),第 706 页。

[12] [韩] 李宽敏 LI Kuanmin:《中国基督教史略》*Zhongguo jidujiao shilu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8 年版),第 229 页。

等原因,而且也是口头上的、暂时的信教。因此,有的教堂建成后,因教徒不多,历时不久便停止活动。

## 2. 传教团体

进入青海地区的新教传教团体主要是内地会、宣道会、神召会和安息日会。

中国内地会,总部最初在杭州,后来迁至上海,慢慢地把宣教工作传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在中国设立了360多个布道区和活动点。兰州设甘、宁、青区会,区会下设监督,统管甘宁青布道区,西宁布道区是其中之一。内地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由于此会能够吸收基督新教内不同派的传教士参加,故其传播活动比较活跃、广泛。“至解放前,青海地区教会有250人,负责人为西宁人星天光。”<sup>[13]</sup>

宣道会,1888年开始,差遣传教士到中国宣教。宣道会在初期到中国传教时,曾将传教重点放在北部长城沿线,总部设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后来山西北部6个传教站交给中国内地会负责。到1900年,已经有16个传教站和200名信徒,下设华中部、华西部、华南部、川黔部、上海。其中华西部甘肃中有青海循化。

神召会,在中国最早的拓荒者是辛普送(William W. Simpson),美国人,原名席如珍,他在1892年抵达中国,原先是以宣道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1912年他回到美国受到五旬节运动的影响也被圣灵充满,1915年以后就正式成为美国神召会的宣教士,他主要是在甘肃省工作,以后有柯夫曼(Ivan S. Karffman)、柏立美(V. G. Plymire)在1908年进入甘肃及西藏的边界工作。1920年柏立美加入神召会,再回到甘肃丹噶尔(今湟源)继续传福音。1918年,辛普送在甘肃岷县建立神召会总会,因教务发展,后改称西北神召会,在甘肃30多个县成立神召会支会,后教务扩展到青海西宁、同仁、湟源、保安、贵德等地。神召会传入中国后共设7个区议会,青海的神召会属“华西区议会”管辖。最初由美籍牧师柏立美来青海传教,在湟源和同仁保安镇建立教堂。神召会由美籍牧师柏立美和英籍传教士明约翰主持。1949年柏立美回国后,由中国牧师石子明主持。教徒约100余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全国分为六区,发展很快。安息日会在青海设立教堂较晚,属“甘青区安息日会第一分会”管辖,西宁设有教会。1929年甘肃基督教总会派陕西籍牧师陈文学到西宁传教,开始在教场街和北大街搭设帐篷传教。其经济来源由美国的一个差会供给。数月之后,又租大佛寺房屋5间,传教1年多。接着又在莫家街租房数十间,设立了教堂。1937年,在乐都县和大通许家寨设教堂。

## 3. 教堂分布

青海基督教堂主要分布在东部农区及传统的农区和牧区交接处,一般都有传教士和教堂。

北斗宫街福音堂,1891年内地会英籍牧师劳受福、胡立礼、乐以成,租西宁府西宁县城内北斗宫街段绍邦坐北向南中式房一院,院内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六间,院中横土墙一道,两边开旁门,西南角、东南角各有小房一间;大门一间,大门内左右各有小房一间,门外照墙一座,东至民人赵怀庆店房,西至大树街,南至北斗宫,北至民人郭均房为界。这是基督教在青海地区设立的第一座教堂。

教场街福音堂,1904年胡立礼用1000两银子购得教场街1号袁春华和宋发旺二人的地皮约6.5亩,建造了福音堂,盖了礼拜堂和传教士宿舍,即现西宁教场街基督教堂。教场街福音堂因毗邻藏传佛教大佛寺,专门针对朝拜大佛寺的蒙藏民设立布道处,愿意聆听牧师布道者,可免费住宿,备有藏文圣经,由懂藏语的人负责解读。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派专人去塔尔寺,散发藏文圣经及各类藏文书刊传单。

祁家场宣教点,作为回族的宣道所,1934年由美籍传教士海春深,从二十里铺人薛得奎的手中购

[13] 本书编委会 Bensch bianweihui;《甘肃省志·宗教志》Gansu zhi Zongjiao zhi[Record of Gansu Record of Religions](第七十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Gansu People's Press],2005年版),第335页。

得2.5亩地基及南房7间,又从南川星家庄人手中购得楼房上下6间,用做宿舍,共计银元480元。由精通阿拉伯语的牧师海春深向阿訇及穆斯林信徒讲解基督教。

安息日会福音堂,1929年甘肃总会派华籍安息日会陕西籍牧师陈文学来西宁传教,在莫家街租房数十间,设立了教堂。青海安息日会属“甘青区安息日会第一分会”管辖。先后由牧师陈文学和沈克昌主持。

大通县主要有大通县福音堂、后子河福音堂、老虎沟宣教点、安息日会许家寨教堂。

贵德县主要有贵德福音堂、贵德河阴“西宁基督教内地会贵德分会”。

湟源县主要有湟源福音堂、南城壕传教点。

湟中县星家庄传教点。

同仁县主要有同仁福音堂(苏吉乎滩)、同仁保安堡传教点。

化隆县主要有化隆福音堂。

民和县主要有民和福音堂、川口、古鄯传教点。

乐都县主要有安息日会仓门街教堂。

循化县主要有循化西大街宣教点。

门源县主要有浩门镇宣教点。

互助县主要有祁塔尔、威远镇、甘家堡教会。

从青海地区基督教堂的分布、差会组织的主要任务来看,针对藏、回、土、蒙古、撒拉族开展工作,但巨大的语言差异、信仰传统,传教士很难取得突破,信徒较少。

## (二)近代青海基督教社会事业

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组织通常具有比较固定的区域和地点。如建在城市里的教堂、学校、医院、诊疗所。以城市为中心形成若干小的传教点,如较小的农村传道点,建有小礼拜堂。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基督教传教士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以此为基础,他们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但其目的很明确,以基督教信仰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1900年以后,除了内地会以外,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使整个中国社会基督化,而不是仅仅转变个人的信仰。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投向了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sup>[14]</sup>更多地借助学校、医药事业来推广基督教事业。青海地区基督教社会事业与内地其他地区大同小异,基本上以学校、医院来拓展教务事业,但针对青海地区民族、宗教信仰,传教士能够直接地使用宣讲方式和广泛地利用当地文字语言,特别是注重巡回传教方法,如传播福音时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讲道地区的资料。

传教士在青海开设的学校主要是西宁教场街福音堂小学,另外在湟源、同仁等福音堂内也设有学堂,授课对象大部分是信徒或信徒子女。学校班次有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共计120人。聘请张乐天、刘建英、姜治国等6人为教师,主课是语文、数学、英语、四书,每天早上7点至7点半,教授圣经课半小时。每礼拜天,做完礼拜,每位学生将圣经中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写成字条,送到街上的行人手中。

近日来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教士设立的专门医院很少,基本上是教堂和诊所混为一体,一般采取为信教者提供生活费用、免费治疗等办法吸引入教,扩大影响。如化隆县波隆德圣光医院,1948年,由美籍传教士贾立克修建的。有专门的外籍和外省信徒女护士。医院一边治疗地方病,培养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边传播基督教。解放后,医院被政府接管,外籍牧师被遣返,信徒被遣散。

[14] 顾卫民 GU Weimin 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Jidujiao yu jindai zhongguo*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a],(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ress],1996年版),第352页。

#### 四、基督教在近代青海地区传播特点及影响<sup>[15]</sup>

近代青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体系、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影响基督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 (一)基督教在近代青海地区传播特点

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堂的分布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农业区,如西宁、民和、乐都、互助、大通、湟中、湟源等地,农业区与牧业区交界地区也有部分堂点,如贵德、循化、化隆、同仁等地。

##### 1. 形成以西宁为中心的传教格局

传教士以西宁为中心,修建教堂、医院、学校为活动点,主日教堂礼拜中,或在医院、诊所行医中,或在学校教学中宣教,故教堂兼有医院、诊所、学校功能为一体,从地区中心城市到周边县城辐射,再由县城向周边村镇扩散。这种传教模式以传教士每到一地先购买土地,然后修建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传教士在青海,把西宁作为青海传教中心,辐射到周边大通、湟源、乐都、湟中、化隆、循化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建堂设点,然后以堂点为中心,再向村镇扩散。

##### 2. 以藏、回等少数民族为主要传教对象

青海地处内陆地区,是连接边疆和内地的交汇处,世居青海民族有汉、藏、回、蒙古、土、撒拉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传教士基于对青海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的认知,来确定他们的传教策略。”<sup>[16]</sup>从1885年西宁设为基督教宣教区以来,就是针对藏、回等少数民族宣教,但青海地区少数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根深蒂固,基督教信仰很难浸入这些民族的信仰体系中,汉族反而成为被传教的主要对象和信仰基督教的主体,这也真实反映了近代时期基督教在青海发展情况,信徒汉族最多,蒙古、藏、土族信仰者只有少数人,回、撒拉族则无信仰者。

##### 3.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的差异性明显

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青海地区,由于各自传教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传教策略。

天主教传教士活动范围主要以东部农业区为主,围绕西宁周边互助、大通、湟中、湟源、乐都等地,沿湟水河流域传教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传教对象以县城农村汉族为主,形成一人信教,全家入教,带动亲戚入教的现象,各地信教家族姓氏特征突出,如西宁朝阳张姓、寺台子严姓,湟中黑嘴儿的常、贾、魏姓以及西纳川关姓,互助王、万、李姓,大通和西宁的和姓等。<sup>[17]</sup>

基督教虽然是以西宁为中心,但足迹遍及全省各地,活动范围广,在农业区和农牧交界地区都有固定的传教点,如同仁、化隆、贵德、尖扎等地都设有福音堂,使用传教方法上能够直接地使用宣讲方式和广泛地利用各少数民族文字语言,特别是注重巡回传教方法,连福川、海春深等就是典型的巡回布道者。同时,以医院、诊所、学校作为传教手段,针对青海的少数民族开展工作,特别注重藏民族中传教。

##### (二)基督教在近代青海地区传播方法及影响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或文化,通过战争、传教活动等人为的、有计划的进入中国,其传播是

[15] 马明忠 MA Mingzhong:“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Jindai Qinghai diqu jidujiao chuanbo de tedian ji shehui yingxiang” [Th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nflu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Qinghai during the later modern period],《青海民族研究》*Qinghai minzu yanjiu* [A Study on Qinghai Ethnicities]2010年第四期,在本文中重新做了修改。

[16] 见张科 ZHANG Ke、马明忠 MA Mingzhong:“论传教士对近代青海的认知 Lun chuanjiaoshi dui jindi Qinghai de renzhi” [On Missionaries' knowledge to Late Modern Qinghai],《西北民族研究》*Xibei minzu yanjiu* [A Study on North-west Ethnicities],2010年,第2期。

[17] 星普光 XING Puguang:《青海天主教简史》(*Qinghai tianzhujiao jianshi* [A brief history of Qinghai Roman Catholic Church]内部打印稿),第14页。

一个过程,而非结果。“通过这个过程,A送给B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sup>[18]</sup>根据传播学理论对效果的关注自然而然联想到没有产生效果的传播和以及不知道是否产生效果的传播等。青海地区基督教的传播效果,可通过传教士所设立的医院、学校、慈善事业等来进行评判。

### 1. 医院——医务传道

传教士认为“如欲接近回民及藏民,最有效的办法莫如在各县城及其四郊进行巡回医疗工作。”<sup>[19]</sup>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传教方法之一就是“医务传道”,通过医院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获取底层民众信任而便于接近民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毕海澜(Harlan P. Beach)认为“传教医生是最有用的,因为他们能解除中医无法治疗的疾病的痛苦,而受到当地人的感激和赞赏办医院的真正目的是在医院里可以利用空闲向病人作口头传教,并使成千上万的病人得到阅读福音小册子的机会,还可以带回家,成为面酵。”<sup>[20]</sup>雷纳德(D. L. Leonard)直接把医疗工作说成是“传扬福音的最有价值的臂助。……这个工具可以除掉最苛刻的偏见,并博得信任和好评。”<sup>[21]</sup>医务传道体现了传教士一方面借助西方先进的科技手段赢得理解和尊重,吸引民众入教,另一方面,通过西医治疗,吸引年轻人接受西医教育,扩大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改变中国人的观念。青海地区教会医院或诊疗所除天主教公教医院以外,其他的规模较小,一般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收治能力有限,如湟源、贵德等地教堂诊所规模较小,没有病床,设备简陋,但治疗方法相对有效,使患者从自身经历对传教士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持肯定态度。医生兼传教士的身份并没有把医治对象接受或信仰基督教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前提,在传播宗教信仰之外,赋予“医务传道”以世俗的意义,“使一种传教思想超越了纯粹的宗教内容”,<sup>[22]</sup>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传教士传教行为。

### 2. 学校——教育传教

传教士最初来华,主张直接面向大众传教,以拯救异教徒的灵魂,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脱离罪恶,他们认为发展信徒是最重要的事业。但中国民众对外来宗教的认同度很低,抱有敌视态度,对传教士的布道毫无兴趣,传教士逐渐认识到直接面对民众传教,收效甚微,转而寻求文化传教方法即教育传教。青海地区教会学校的设立仍然以西宁为中心。如西宁教场街基督教福音堂室内设有学堂,招收学生。传教士开办学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传教人员,发展教徒。实际上学校中发展的信徒并不多,但通过这种教育传教的间接方式,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教育传教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一意义来说,是传教工作本色化的结果。

### 3. 言行——潜移默化

青海地区基督教也不例外,通过传教士努力促使思想观念的转变。进入青海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以妇女居多,大多是夫妻共同进行传教布道,他们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或者是医生、护士,言传身

[18] [美]约翰·福斯克 Yuehan Fusike [John Fox] 等著,《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Guanjian gainian: Chuanbo yu wenhua yanjiu cidian* [Ke Conceptions: Dictionary of Studie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新华出版社 Xinhua chubanshe [Xinhua Press],2004年),第45页。

[19]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 Zhonghua xuxing weiyuanhui 编,蔡詠春 CAI Yongchun、文庸 WEN Yong、段琦 DUAN Qi、杨周怀 YANG Zhouhuai 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nian Zhongguo jidujiao diaocha ziliao [Data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1901-1920](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7年版),第331页。

[20] 谢纪恩 XIE Ji'en:“美国公理会教士鼓吹加紧对华文化侵略 Meiguogonglihui jiaoshi guchui jiajin duihua wnhua qinglue” [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aries Advocate stepping up cultural invasion to China],《近代史资料》*Jindai shi ziliao* [Materials on Late Modern History],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1963年第3期。

[21] Ibid.

[22] 吴义雄 WU Yixiong:《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Zai zongjiao yu shisu zhijian - Jidujiao xinjiao chuanjiaoshi zai Huanan yanhai de zaoqi huodong yanjiu*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ity - A Study on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Huana coast region],(广东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2000年版),第299页。

教,许多信教妇女开始步入社会,从事基督教事业。同时,传教士把本国先进的科技产品带入传教地区,使更多地人接受舶来品。通过传教士言传身教,使得被传教地区民众无论信教或不信教,从最初的疑惑、排斥、抗拒,逐渐接受,最后心安理得接纳,都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洋”字号产品逐渐流行。

教堂、学校、医院等构成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社区生活的缩影。当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其必与所处地域社会产生互动、冲突或认同等。近代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教士为了立足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逐步建立起以传播基督信仰为核心,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传播结构和体系。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一个陌生社会文化体系中显现出来,被人们所关注,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于这种异质的文化元素进行批评、选择、决定采纳或拒绝,由此产生相互交流、适应、融合的问题,皈依基督宗教的信仰群体决定采纳的异质文化元素融合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很难保留异质文化元素的原形。

### (三)基督教与近代青海社会的互动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必然与所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互动。近代基督教传入青海地区,必然与所处社会产生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当地政治利益集团态度,与所处社会民族交往或联系,与信仰不同宗教群体地相处,以及与当地文化的适应。

#### 1. 与青海地区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

基督教以炮舰为后盾而进入中国境内,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不同的特殊力量,与官绅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分庭抗礼,存在利益纠纷与冲突。传教士作为外来群体,“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了直接的威胁”<sup>[23]</sup>传教士凭籍着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遇到始料不及的阻力,即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将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视为同物,在西陲内陆的青海地区也蔓延着这种排斥、敌视的现象。如“天主、福音各教,传教者均挟市道,入教者多系盲从,甚或利用教民,武断乡曲,凭籍牧司,挟制官宰,于教旨教义,毫无裨益可言。”<sup>[24]</sup>

虽然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但为了迎合地方当政者等,也扮演着与传教身份不相符的角色。如天主教许让神父,1911—1922年间,在西宁边界地区传教,同时给“这一地区的最高汉人长官的儿子几何和代数,因此有机会认识这个城市的所有汉人官员和学者。结果,经常有村子里的首领、蕃土司、蒙古尔土司、喇嘛寺院的首领请我帮助他们向汉人官员陈述他们的问题,我扮演着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友好的调解人的角色。”<sup>[25]</sup>从上描述中可以看出,传教士进入青海地区,结交当地头面人物,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为传教奠定政治基础。如马步芳家族对外关系中,为便于了解国内外时事,除了依靠官书和函电外,依靠西宁天主堂德籍神父夏思德。夏思德等历年送给马步芳家族现代化的军用品和实物之类,如手枪、军刀、电炉、收音机、发电机、钢丝床、西餐灶具及器皿等。而夏思德等乘机吸收教徒,发展天主教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有的神父们平时赴农、牧业区活动,持有马步芳发给的护照。有时马步芳还指令县政府派给警卫人员保护,俨然像行政官吏。1936年马步芳

[23] [美] 费正清 FEI Zhengqing:《剑桥中国晚清史》*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 shi*[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ate Qing](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3年版),第608页。

[24] 王昱 WANG Yu、李庆涛 LI Qingtao 编:《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Qinghai fengtu gaikuang diaocha ji* [A data on Qinghai folks and customs],(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Qinghai People's Press],1985年版),第61页。

[25] [比] Louis Schram,李美玲 LI Meiling 译:《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Ganqing bianjie Mengguerren de qi yuan, lishi ji shehui zuzhi*[The origin,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Monger in the area between Gansu and Qinghai],(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Qinghai people's press],2007年版),前言。

在河西反红军中,积极联络西宁天主堂和福音堂的神父牧师,参加活动。<sup>[26]</sup> 传教士与青海当政者之间的活动,体现了两者为了各自利益互为利用。

## 2. 与青海地区民族交往

如前所述,传教士在蒙、藏、土各族中,主要是迎合各族王公、千户、百户头人的心理,宣传入教,通过治疗疾病、交易等手段扩大宣传。特别是为了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增加认同,改穿当地民族服饰,学说民族语言,用蒙、藏、阿拉伯文翻译《圣经》,四处散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用布匹、茶叶、面粉、糖酒、日用品、西药等,进行拉拢,在西宁和湟源教堂附设的旅店中,免费提供茶水、诊治病人或替蒙、藏族人照像,代购商品、粮食等。凡是有任何需求,都能一一照料,以此来吸引入教。由于蒙、藏族人信奉藏传佛教,很少有人入教,但传教士仍乐此不疲,藉机联络感情,以便他们在牧业区进行调查或测量时,减少压力,有时还可得到帮助。但这种交往之中也产生一些冲突,如1898年,英国传教士僖德生夫妇在循化保安兼营收购羊毛,因在收购羊毛中重利盘剥,激起藏族群众的愤懑。当地藏族头人曾联名呈请循化厅同知张作霖不准僖德生留住,但张作霖惧怕洋人势力,不敢受理。同年6月初,麻巴、郎加等庄藏族,包围僖德生住所,驱逐僖德生,张作霖派兵保护僖德生夫妇到循化城内暂住。后西宁兵备道燕起烈和总办甘肃洋教交涉事务、兰州道黄云严令循化藏族赔偿僖德生的损失,并指派保安藏族头人“具结保护”僖德生住所。<sup>[27]</sup> 这种冲突是因传教士经商利益纠纷而产生,并非传教所致。传教士尽量使自己融入到当地社会,适应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其目的仍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 3. 与青海地区不同宗教信仰者的联系

近代青海地区虽地处西北内陆,经济、文化落后,但宗教影响历史久远,信教人数众多。因而,传教士不可避免地要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相处、交流。如荷兰传教士瑞吉纳特1892年到湟中鲁沙尔,与塔尔寺喇嘛交流,研究藏人生活习性,学习藏语言文字,而喇嘛称他为“来自西方的白喇嘛”。<sup>[28]</sup> 同时喇嘛也研究基督教,如青海喇嘛领袖古伦子林(Kurung Tsering)写信索要有关基督教资料,信中写道“仆曾见有《圣经》数部,开卷朗诵令人憬然归信基督。现已少悟独生子之名义及其训言,惟极不了解一切圣灵之性质与要旨以及贵教之历史。务请详细解释一切以开茅塞,俾才学疏浅、脑力薄弱如仆者亦得以窥其崖略也。”“教授医药、天文等科学亦属要端。仆已知凡欲蒙神祝福者,必信上帝独生子之宗教。务祈阁下分别指示,不可置而不答也,祇颂万福。”<sup>[29]</sup> 古伦子林即藏传佛教宁玛派领袖古浪仓三世哲切洋多杰(1871-1933年)。古浪仓活佛曾一度聘请西宁福音堂美籍牧师教授西医,<sup>[30]</sup> 其写信目的以研究基督教名义,研究西医等科技。

美籍传教士海春深,“在西北回族穆斯林社区走访时使用阿拉伯名字哈姆扎,1917年到西宁,学习

[26] 陈秉渊 CHEN Bingyuan:《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MA Bufang jiazhu tongzhi Qinghai sishi nian* [The forty years of MA Bufang family ruling in Qinghai] (修订本),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Qinghai People's Press], 1986年版), 第112~113页。

[27]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 Qinghai sheng zhi bianchuan weiyuanhui:《青海历史纪要》*Qinghai lishi jiyao* [Documentary of Qinghai history],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Qinghai People's Press], 1987年), 第241页。

[28] 房建昌 FANG Jianchang:“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 Jianada jidujiao chuanjiaoshi Ruijinate fufu zai Qinghai zangzu diqu de chuanjiao huodong ji qita”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anadian missionary couple Ruijinate in the Tibetan region in Qinghai and others],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Qi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88年第2期, 第120~122页。

[29]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 Zhonghua xuxing weiyuanhui 编, 蔡詠春 CAI Yongchun、文庸 WEN Yong、段琦 DUAN Qi、杨周怀 YANG Zhouhuai 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nian Zhongguo jidujiao diaocha ziliao* [Data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during 1901-1920]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年版), 第695页。

[30] 沈桐清 SHEN Tongqing:“我所知道的古浪仓活佛 Wo suo zhidao de Gulangcang huofu” [The Buddha Gulangcang whom I know], 《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Qinghai wenshi ziliao jicui renwu juan*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People in Qinghai] (内部资料), 2001年, 第247页。

阿拉伯语,研究《古兰经》,到穆斯林村庄巡回布道。传教士们通过经常到清真寺、穆斯林家庭拜访,邀请阿訇、满拉到基督教堂访问等方式,深入讨论宗教问题,相互进行各种形式的辩论。”<sup>[31]</sup>针对穆斯林社区,海春深也提出了一些相应地传教对策。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白种人,虽然能够在偏远的村落引起当地穆斯林群众的轰动和好奇,但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使传教士在青海地区穆斯林的宣教布道没有取得丝毫的进展。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信仰传统的区域传播基督教,体现了传教士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为“上帝服务”的信念。

基督教与近代青海地区社会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传教士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接触、交流,竭力展现基督教文化的底色。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以便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足够的了解,能够顺利地实现互动。因而,基督教进入青海地区,无论是采取何种传教方式和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基督宗教影响。从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教的特点,可以看到基督教在青海地区传播和发展与内地基督教传播有很大的差异。传教士首先面临复杂的地理环境,在高海拔地区居住、生活、传教,如何适应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传教士来讲就是一种挑战,加上区域性差异明显,农业区、牧业区和农牧交界区,普遍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如何选择传教区域?同时多种管理制度并行,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特别在具有浓郁宗教信仰的地区,存在选择何种方式传教的问题。虽然传教士借助医院、学校等传教手段,与内地传教士传教方法大致相同,但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使传教士面临巨大的困难,难以撼动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虽然传教士在青海地区的活动并没有取得他们所预期的效果,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有效地促进了青海与西方社会和中国内地的交流。

[31] 刘钦花 LIU Qinhu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传教方法 Xifang chuanjiaoshi zai ZHongguo huizang Musilin zhong de chuanjiao fangfa” [The Western Missionary's method of spreading among Hui and Zang ethnicities in China], 特木勒 Temule 编:《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 Duoyuan zuqun yu Zhongxi wenhua jiaoliu: Jiyu Zhongxi wenxian de xin yanjiu [Pluralistic Ethnicities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 new research based on the Sino-Western documents],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年版)。

**English Title:**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plural Ethnic and Religious Ecological Context in Qinghai during the Late Modern Period**

**MA Mingzhong**

Professor, Qinghai Party School, Huanghe Road 2, Xining, 81001 Qinghai Province, Tel: + 86-131-9577-8150. Email. 382344133@qq.com.

**ZHANG K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Studies,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Chengdong District Bayi Zhonglu No. 3, , 81007 Xining City, Qinghai Province, P. R. China. Tel. +86-139-9727-5983. Email: qhmyzhangke@163.com

**Abstract:** Qinghai is a co-existing example of plural religions in multi-ethnic China. All kinds of religious temples, churches and mosques can be found around, and almost every person among Zang, Hui, Tu, Sala and Mongolia ethnic groups believe in their religions. In such a pluralistic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text, the location and spreading trend of modern Christianity in this region have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period. To study how Christianity has exchanged, adapted and mutually reacted with the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in Qinghai area,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modern China.

**Key Words:** Christianity, Late Modern Qinghai area, spreading